大失业

THE GREAT UNEMPLOYMENT

萧条时代与民众幸福生活保卫战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不能安心？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1）
-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2）
-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3）
- 全球失业警报已经拉响（1）
- 全球失业警报已经拉响（2）
- 考验，也许是空前的（1）
- 考验，也许是空前的（2）
- 灾难不仅仅属于别人（1）
- 灾难不仅仅属于别人（2）
- 中国，不能回避的现实（1）
- 中国，不能回避的现实（2）
- 失去土地，失业的开始（1）
- 失去土地，失业的开始（2）
- 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1）
- 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2）
- 机器真的抢了人的饭碗（1）
- 机器真的抢了人的饭碗（2）
- 走与留？饥寒交迫的奴隶（1）
- 走与留？饥寒交迫的奴隶（2）
- 铁血首相的甜蜜“糖果”（1）
- 铁血首相的甜蜜“糖果”（2）
- 像畜牲一样活着（1）
- 像畜牲一样活着（2）
- “非理性繁荣”的代价（1）
- “牛仔硬汉”遭遇“失业休克”（1）
- “牛仔硬汉”遭遇“失业休克（2）
- 灾难中的柔韧力量（1）
- 缩水的幸福——合住房与午餐肉（1）
- 穷人最需要精神支柱（1）
- 资本主义“从冷血到温情”（1）

- 美国梦不变（1）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1）

008年，迫于经营压力，通用汽车的CEO瓦戈纳请3万多员工吃了“鱿鱼”，2009年3月29日，新上任的奥巴马总统则毫不客气地请瓦戈纳吃了“鱿鱼”。而早在2007年下半年，华尔街就已经有十多家银行的CEO被解聘，他们在被解聘之前，通常先解聘了成千上万名员工。

2008年6月，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约苏亚·珀斯基在失业6个月仍未能找到工作的情况下，开始走上纽约街头“卖身”。他在胸前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业务娴熟，麻省理工学院毕业，求一工作”，牌子的下方写有自己的联系方式。珀斯基因此出名了，哥伦比亚的一家电视台对他进行了专访，希腊的一本财经杂志请他做了封面人物，不过他说：“感谢大家给予了我巨大的关注和支持，但我最需要的还是一份工作。”

我们这个时代常被称作“工业化社会”或者“后工业化社会”，这个时代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要靠工作谋生，也都随时可能与失业的危险相伴。无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家，无论你是白领、蓝领、金领、粉领、灰领，获得一份工作、想方设法保住工作、换一份更好的工作、应对猝不及防的失业以及再找一份工作，都是你一辈子随时随地要面对的生活主题。

于是，在这个地球的各个不同角度，就出现了这样的片段和故事。

事件一：青年人迷上《蟹工船》。地点：日本东京

《蟹工船》本是一部写作于1929的日本小说，它描写一群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和穷学生来到“博光丸”蟹工船上打工，并与监工进行血腥斗争的故事。这样的小说，创作于共产运动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并没什么稀奇。然而，金融风暴后的2008年年末，这部“过时”的小说突然在日本爆销，发行量突破百万大关，以致书业人士惊呼：“这恐怕是连已故作者小林多喜二做梦都想不到的怪事！”

而这部小说的读者，主要是被称作“新贫人口”的日本青年。根据日本官方统计，目前年收入达不到200万日元的青壮年多达2 000万人，且有三分之一的日本青年做着随时可能被辞退的临时工作。近些年来，经济持续不景气造成了日本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就业问题，更是困难重重。《蟹工船》的火爆，无疑是给失业青年找到了一面自己的镜子。英国媒体报道，日本青年正在以每月1 000人左右的速度投向该国第四大政党——共产党的怀抱，街头工人示威游行的频率越来越高。而这次“向左拐”的先锋部队差不多都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年轻工薪层。

事件二：“啃老族”心安理得混生活；地点：中国上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毕业生成为“啃老族”。小林就是一个代表，据他自己说，他曾经工作过，可他不满在工作中“累死累活还要遭上司白眼”，毅然辞职了。此后5年，他再也没有找到工作，成了名符其实的失业者。小林的父母各自有2 000多元的退休金，家里有两处商品房。其中一处房子用来出租，每月租金中的一部分（500元）是小林的零用钱，吃住则全靠父母。小林说自己失业之后没有朋友，所以花销不大，现在是衣食无忧。对于将来的打算，小林说，他永远也不想工作了，他准备父母百年之后坐吃山空过日子。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2）

像小林这样被称为“知识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国各大城市都很普遍。他们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屡次被辞退，有的因不堪忍受工作的“折磨”而辞职，长期处在无业状态。真的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已经“垮掉了”，还是另有原因？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应该承认，现实社会给年轻人的成功机会太少了！比如，摆在眼前一个大问题就是，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比以往更难！有些专业，可能半数以上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事件三：失业使他们恨透了“中国制造”。地点：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几年前，一家美国纺织公司倒闭后，美国媒体大肆报道失业员工的悲惨处境。于是，普通的美国老百姓们，对“中国制造”的态度越来越复杂。特别是在制造业企业工作的蓝领，当他们面临失业的压力，就很容易把怨气发泄到中国产品身上；但当他们走进商场，又会自然而然地挑选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

当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后，中国商品的订单早已大幅度下滑。而这些美国失业者又重新找到工作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美国人的就业状况，并没有随着货架上中国商品的减少而好转，相反，新的经济萧条使美国乃至全球的失业现象不断恶化。

很容易看清这三个事情的共同点：它们都和失业有关，都反映着失业给人们造成的苦难。

的确，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每一个国家中，都存在着种种不同形式的失业，也都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同的影响。大规模失业的消息，不管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爆出，都会向全世界传递出焦虑与不安。

不管生活在哪个国家，不管他是失业、就业还是待业，他都不愿意听到失业率升高的消息。因为人们都希望自己有一份工作，这样，他们才能幸福地劳动着、生活着、创造着价值！

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到底原因在自己？还是应该怪罪社会？这是一个令经济学家左右为难的问题。不论日本的叛逆青年、中国的“啃老族”还有美国的失业蓝领，他们各异的不幸境遇，都与各自所在国家的经济问题有莫大的联系。

失业，也是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自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世界上就有了“工作”这个概念，同时也有了“失业”这个概念。失业者的不幸到底是谁造成的？怎么才能消灭失业？人类抱着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不断实施社会制度的改革。直至现代社会，保证充分就业，已成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标。可为什么世界上还是广泛地存在失业呢？

是啊，正是为了能幸福地劳动着，人类已经奋斗了几千年。

人类需要休息，需要学习，也需要工作谋生，并为世界贡献自己的价值、体现自己的才能，人们希望创造一个“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钱挣”的社会。但是，失业的阴影，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尽管一代代的政府和经济学家们都进行了无数努力和探索，但失业仍然无法从我们的生活中根除。

为了幸福地劳动着（3）

就像在《蟹工船》描写的时代一样，无数和书中主人公一样的人们，为了能够幸福地工作，不惜采用流血暴力的方式，去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诉求。

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啃老族”青年们，他们也梦想有一份美好的工作。尽管他们嘴上说自己讨厌工作，永远不想工作。可他们心底从未放弃成功的梦想，他们往往只能在电脑游戏的虚拟世界中寄托自己的梦，幻想自己担当着重要责任，完成了伟大的使命，以此来忘掉现实中随时可能被解雇、甚至没有工作的窘境。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国家，仍然有很多人在失业，在受穷。特别是“金融海啸”以来，大量企业倒闭裁员，从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到底特律的汽车工人，都纷纷地遭到解雇，不得不丢掉自己赖以维生的工作……

在一个各国人民以“工作”为主要甚至几乎是惟一谋生手段的时代中，失业，可能是民众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之一。失业，就是这样一个百年大难。失业，也是金融危机演化成经济危机之后，未来世界新的困局。

我们应该关心了！失业，不仅仅是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失业者”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收入丰厚的工作。都希望假如自己不幸失业，能尽快地找到新工作，而且自己失业期间的生活能有基本的保障。一句话，我们都希望在一生中能够幸福地劳动着。正因如此，我们应该把对失业的关注放到头等大事的位置。

也许你已经失业，也许你正准备找工作，也许你现在依然有着不错的工作，也许你觉得你能力强、素质高，失业不会降临在你的头上。但不管你处在怎样的工作状态，你都应该关心失业，通过了解工

业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失业现象，来思考和理解失业背后的经济问题。

因为失业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也是一切社会矛盾演进的结果。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智慧和理性的学问，而失业是种种经济问题的纠结，它是经济学之核。了解工作与失业，以及失业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可以使你增长智慧和理性，对一切经济和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的见解和预判；可以使你看清几百年来资本与劳动的博弈，使你懂得如何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工作。只有这样，你才能有力量去帮助你自己，或者帮助亲友甚至社会民众都能更好、更有效的工作。

如果这样，你不会再像日本的失业青年那样，去寻找暴力的反叛；你也不会再像上海、北京的啃老族那样，放弃尝试过更美妙生活的机会；面对经济泡沫与经济危机的轮转演化，你也不会再茫然失措。只要了解工作的本质，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你就能够洞查世事，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睿智地发现机会，勇敢地把握职场人生……

作为在“工业社会”生活的人，我们该去系统地考察“工作”本身了。为了幸福地生活着，为了幸福地劳动着……

全球失业警报已经拉响（1）

Guide

本章导读

心情定义：震惊

糟糕指数：★★★★☆

星期一，悠闲或者疯狂的周末假期结束了，新一轮枯燥乏味的工作又要开始了，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么？——那就是不用上班了。2009年1月26日是中国的春节，然而，这一天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职场人士来说，却是一个“血腥的”日子。这一天，全球有10多万人被告知不用去上班了。

随着“金融海啸”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加深，被经济学家称为“百年不遇的萧条期”已经到来！在此影响下，失业率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失业、找工作、经济拮据，成了身边亲友闲谈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失业不再陌生，不再仅仅属于所谓的“弱势人群”，不再与自己毫不相关。

人们害怕失业，尤其害怕在经济危机时期失业。可没有任何时期，比经济危机时期人们更容易失业。从华尔街的精英，到亚洲血汗工厂的蓝领工人，有谁能确保自己可以逃脱此劫?

那么，为什么人类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失业？而经济危机又将失业的阴霾吹遍全球？失业现象背后的历史玄机，又会告诉我们一个个怎样的故事?

全球失业警报已经拉响

2009年1月26日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然而，这一天对于许多西方国家的职场人士来说，却是又一个“血腥的”日子。

2009年1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一。星期一，本来是度过一个周末假期之后，再次投入紧张工作的开始。

这个星期一，也是金融海啸之后，前途迷茫的人们所迎来的新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正是在这样一个星期一，一天之内全球有逾10万人失去了自己的饭碗，以至于英国《泰晤士报》称：“1月26日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黑暗的日子。”

旧年年末与新年年初是很多公司的财务结算期。2008年与2009年相交的这一个“财务结算期”，西方国家早已频频爆出“裁员地震”。美国、欧洲、日本的多间大企业，因业绩迅速恶化，纷纷实行集中裁员。

2008年11月，美国花旗集团创下单日裁员5万人的记录。当日历翻到新年，裁员风潮愈演愈烈，媒体上不断有新的“裁员纪录”出现。2009年1月16日，全球20家知名公司单日裁员共达2.1万人。

1月16日是星期五，按照一般公司的习惯，本来要放假欢度周末了。然而，在这个星期五，对这2.1万人来说，迎来的不是愉快的周末，而是收到了无奈的失业通知，从此，他们可

全球失业警报已经拉响（2）

能将永远离开自己工作过的世界知名公司。这些公司中，包括AMD公司、美国第二大汽车租赁商赫兹全球控股公司、罗马尼亚第二大化肥生产商Amonil公司、菲亚特旗下的马瑞利公司，等等。

十天之后的1月26日，单日裁员的数字又飚升到新的高度，各国企业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天宣布大规模裁员计划，总数高达到10万人。在这一天，美国主要大企业就有5.6万人失去了工作。其中，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的美国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公司的动作最大，一举裁掉了2万人。

欧洲也难以逃脱裁员风潮。欧洲最大的电子设备商荷兰飞利浦公司、荷兰银行和保险公司“荷兰国际集团”，以及欧洲第二大钢铁企业英国科鲁斯钢铁集团公司，也都宣布裁员。宣布裁员的公司涉及多个行业，这显示裁员现象已经超出住房和金融领域，扩大到几乎每一个经济领域。

“失业”已经深深刻在2008年的全球记忆中，它还成了2009年人们最担心的事情。根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2008年全年失业总人数为260万人，这是自1945年以来的失业人口最多的一年。

到了2009年，根据美国政府的报告，1月份一个月美国就减少了59.8万个就业职位，是34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失业率达到7.6%，创16年来新高。这些数字比经济学家们预期的更糟糕。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之一，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可以大略地描绘出美国经济的状况。不过和资本市场不一样，失业率报告反映出来的情况存在滞后性。而且，美国失业率统计并不是面面俱到，那些希望得到岗位又放弃了寻找工作的人数就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因此，仅仅是失业率统计数字的提高，还不是最严重的。

更为严重的数据信息是，美国企业的“新雇佣人员”数字，正在以更巨大的幅度减少。

自2000年以来，美国劳动部对于各公司雇佣新人，增加职位和裁员数据都有统计。而根据最近的统计，目前各公司不仅大幅裁员，而且以更大的幅度减少雇佣新人的计划。仅2008年11月，美国的裁员数字就比一年前升了17%。同时，雇佣新人数字比一年前降了26%，新增就业职位比一年前降了30%。

这就意味着人们一旦失业，再找到新职位的机会很小。不仅如此，新雇佣人员数字超过失业人员数字，还表明失业率会进一步提高，失业的灾难将是长期的。

这场世界性的裁员，显然只是个开头。国际劳工组织估算，2009年末全球失业人口将增至2.1亿，这也将是10年来全球失业人数首次突破2亿人大关。而瑞士再保险公司驻纽约的首席经济学家卡尔（Kurt Karl）预计，裁员将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

再次经济危机一旦来临，首先遭殃的就是雇员的饭碗，这一规律再次得到证实。

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情况同样糟糕。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原本是以电子、塑料、纺织品致富的出口工业基地，而如今，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制造业面临着空前的困境。经济学家们指出，企业“可能面临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更加严峻的挑战”。

自1992年以来，深圳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城市。然而，2008年深圳各工厂不断倒闭，导致了5万多人失业。

东莞是仅次于深圳的工业城市，而2008年，东莞已有7千家工厂相继停业、破产，东莞火车站每天都滞留着近万名因失业而等着回家的外省农民工。据《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称，由于在解雇补偿费问题上出现争议，数百名工人在一家玩具厂外进行抗议。工人们袭击了工厂办公室，甚至掀翻警车。

往年，春节回乡探亲的农民工都会给“春运”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而2009年的春节还没到，就已经形成了衣食无着的失业农民工的

返乡大潮。有消息称，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之中，有780万春节前已经因失业而提前返乡，而真正的就业压力将出现在春节后。同时

考验，也许是空前的（1）

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十分严峻。

世界银行（World Bank）把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7.5%，而许多政府官员认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达到8%，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2009年，无疑是艰难的一年。西方艰难，东方艰难，打工仔艰难，老板艰难。“金融危机”真正体现出它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它已经转化成了“失业危机”。在这一年，很多人可能会失去工作。

考验，也许是空前的

对于现代人来讲，工作，显然是个天大的事情。

不论你生活在哪个国度，不论你是富裕还是贫穷，不论你是蓝领、白领、金领、粉领、灰领、尖领、圆领、方领……你都要日复一日往返于住所与工作场所之间，日复一日为生活而奔波。忙碌却充实，有些无奈又满含求索，工作带给你的不仅是一个饭碗，还有一份尊严，一种希望。

然而，失去工作的危险却随时存在着。失业不仅使人囊中羞涩，还打击着人的精神。失业率的高低，常常与犯罪、吸毒、离婚等统计数字联系在一起。解雇造成的创伤，也不亚于亲友的去世或学业上的失败。

失业，威胁着家庭这个最基本社会单位和经济单位的稳定，没有收入或收入减少了，家庭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家庭关系就会因此受到损害。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也很容易受到失业的严重影响，使失业者在心理上体验到更严重的挫败感。

失业的经济影响，可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解释，当失业率上升时，经济中本可由失业人员生产出来的产品和劳务就损失了。衰退期间的损失，就好像是将众多的汽车、房屋、衣物和其他物品都销毁掉了。

按照最简单的分类，经济学家把失业的类型归纳为三种：劳动力供求双方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技术进步引发产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Structual Unemployment）；以及由于经济周期影响所造成的“周期性失业”(Cyclical Unemployment）。

其中，“摩擦性失业”是不可避免，也是短期的。“结构性失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代价，从长远来看，其造成的失业人员也会被不断扩张的新兴产业所吸收。而经济萧条所引发的“周期性失业”，却是全球各国政府的难题，也是所有需要工作的人们的噩梦。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孪生兄弟就是经济危机，它如同一位守时的客人，每隔若干年就不请自来，吞食着人类的财富，留下贫穷与动乱作为礼物。

经济危机，也几乎是失业的代名词。在经济危机时代，各种经济数据的灰暗指标毕竟是学者们书桌上的材料，而失业，却是生活中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关乎你的左邻右舍、你的家人朋友，甚至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自工业革命时期以来，每当经济发生波动，就业的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历史上，我们经过了很多次的失业大潮，当时，不仅失业的人恐慌，没有失业的人也恐慌，因为高失业率总是与经济危机、发展停滞、贫穷、动乱甚至战争联系在一起。

“凯恩斯主义”（Keynesian）兴盛之后，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被归纳为“有效需求不足”。于是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来拉动内需，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解决就业问题和刺激经济发展的杀手锏。就如近期，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推出了超过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公共设施的追加投资来创造就业机会。其承诺的就业目标也是一再上调，先是竞选期间所保证的100万个就业机会，2009年后，又上调到300万、400万……美

考验，也许是空前的（2）

联储也不闲着，它祭出了非常规武器，除了把基准利率降至半个世纪以来最低水平外，它还将采取其他非常规措施，来配合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让人们又看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子。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固然可以创造一些就业机会。然而，上个世纪的良方，究竟能否解决新世纪这场空前的大萧条？一切都是未知数。奥巴马固然为就业问题忧心忡忡，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现成的”有效对策。

“对于现在的危机并没有快速的解决方法，毕竟危机是耗费了几年的时间才逐渐形成。在情况好转之前我们只能等待最糟糕的时刻来临。”奥巴马只能如此安慰人们。他这些话，也道出了现实的真相。

正所谓“世事难料”。在金融危机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美国失业率节节上升的2008年上半年，面对“危机结束之前，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10%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无一例外地用一种令人尊敬的自信口吻回答：“可能性是零。”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预测美国的失业率还将上升，最终将超过10%的水平。

美国的这次经济萧条，与以往相比还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次贷危机”造成的结果是金融业的瘫痪和信用的枯竭，这对于服务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而美国恰恰是一个服务业占主导、服务业吸收大量就业人员的典型国家。

根据美国劳工部2008年12月份的一份报告，最令人担忧的当属服务业就业人数减少了37万人，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这个“就业主体”的疲软，还意味着消费支出的继续下降，也就预示着以刺激消费支出来振兴经济的这种做法，其效果将打上很多折扣。

面对次贷时代“金融创新过度”所导致的一系列“连锁灾难”，美国的失业问题变得空前复杂。只有金融信用重新循环起来，使服务业恢复元气，才能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然而从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已经注入近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也只是勉力维持住了金融系统的正常运转而已，距离重振经济的目标还差得太远。

如果说美国的情况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代表，那么在中国，情况又如何呢?

尽管数年来两位数的GDP增长水平，在2008年下降到了9%，但中国经济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尽管我国政府已经公布，受金融危机影响，2 000万农民工已经失业；尽管北京、上海各大都市的知名公司中，时常有裁员事件发生；尽管新闻媒体不断呼吁，2009年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比往年更为艰难。然而，一切仍然显得相对平静。

的确，经济变化对百姓生活的具体影响，有一定的滞后作用。尤其在我国，30年高速增长造成的盲目乐观情绪，使人们很容易对问题的存在视而不见。而也许正是这种“视而不见”，会对我们的将来生活构成可怕的“杀伤力”!

在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失业率的确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到了2008年的上半年，还存在的“民工荒”的现象——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然而，到了2008年末，同是珠三角，却有大批失业农民工不得不提前返乡了。情况恶化之快，未来难题之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种猛烈的变化，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畸形发展是分不开的。过去，中国与美国经济的典型循环是：美国公司向中国企业投资→中国企业制造并出口赢利→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美资继续投资中国赚取利润……

这意味着，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为美国提供了便宜的商品，使得美国人从低端制造业“脱身”，集中发展其金融服务业，得以现实他们“享誉全球”的消费方式——提前消费、赤字消费，或称泡沫消

费。而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又使得美国人可以用贷款消费的方式来维持高水平生活。与其同时，美国跨国企业投资中国所赚到的钱，以及中国购买的大量美国国债，又支持了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这个互相促进，最终导致美国金融业过度创新，大量金融衍生产品形成一环扣一环的连锁效应，只要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则是整个金融系统的“山崩地裂”。

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如同靠在一棵本身已经倾斜的树上。世界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之后，中国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当年，美国的“泡沫消费”吸收了占中国GDP35%的过剩产能，现在情势急转直下，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只能是大面积倒闭了。

的确，在全球经济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充当世界最大的出口国，绝不是什么值得安慰的事情。而最大的灾难，将是席卷到社会每个阶层，从白领到农民工都脱不开的失业大潮。

据有关统计，中国过去GDP每增长1%，就能增加 0.3%的就业机会，而近年来，却只能增加0.1%的就业机会了。据世界银行估计，若要保持现有就业水平，中国经济在2009?的增长率需要达到9.5%。可是，就算是最乐观的中国社科院，对于2009年的GDP增长，也只能勉为其难地给出了9%的答案。

加之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现在面临的就业压力可能是空前的。失业，将是困扰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之一。

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是推出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投资方向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如此措施能够拉动多少经济增长，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而且不能忽视其中可能产生诸如重复建设、腐败问题等副作用。因此，就业市场的情况，很难单凭经济刺激计划得到真正的改善。

产业升级固然是一剂良方，第三产业的发展，能使高素质人口的就业问题得到很大改善。不过，如果无法有效地拉动内需，则会限制整个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产业升级的步伐仍然任重而道远。

现在，我们面临的也许是全球史无前例的就业环境恶化，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摆脱不了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制造业大国，也许，面临的考验将会是空前的……

灾难不仅仅属于别人（1）

灾难不仅仅属于别人

你是否想到过这样的事情：

假如有一天，你需要动用存款或者靠父母的接济过活?

假如有一天，你无法支付父母的医疗费或者子女的学费?

假如有一天，你无法支付那一张张账单和一笔笔开销?

还有你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水准，又究竟能维持多久?

也许你能力强、贡献大、工资高、职位高，但你想过没有，企业实施裁员时，最先“下手”的，往往是工资高的那部分员工……

也许你受过良好的教育，将有辉煌的未来，可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你一肚子的学问，又哪里有用武之地呢?

……

在经济危机来临之前，也许这些问题离你很远。然而，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了。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业。吉安曼科，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附近弗洛里桑特市一名绝望的失业父亲，为了供养两名17岁的双胞胎女儿上学读书，竟然铤而走险当起了“银行劫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抢了圣路易斯市附近地区的12家银行，总共劫得了大约10万美元左右的巨款。

当吉安曼科实施他的第12次抢银行行动时，终于露出马脚，被当地警方一举逮捕归案。消息传来，让他的两位女儿——玛丽和艾丽丝如闻晴天霹雳，她们无法想象，平时温和善良的父亲怎么会是一名劫匪。而另据报道，美国一名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的印度裔男子，失业后开枪打死妻子、3个儿子和岳母后自杀身亡……2008金融海啸之后，惨不忍睹的类似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

经济萧条与失业，往往是一切社会不安定行为，如犯罪、自杀、离婚、吸毒等的发端。不仅如此，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甚至会引

发社会动乱和战争。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如今，新的失业大潮已经来临。贫穷与动乱——对于长期以来生活在“繁荣时代”的人们来讲——就有可能不再仅仅是回忆了。

正是2008年的我国香港地区，由于失业率持续高企，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自杀事件。全年的自杀死亡个案中，有379宗是失业人士，占全港自杀个案的38.4%，其中近八成自杀者的年龄在30岁以上。

我国台湾地区的自杀现象同样严重，2008年台湾自杀人数已跃居台湾十大死因的第九位。关厂、歇业、裁员、减薪、失业，是当前台湾百姓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无处诉说的苦痛。在生活与精神压力下，岛内失业潮与自杀潮相伴，失业引发的社会问题如毒瘤般生长。

2008年，数百名台湾民众自发聚集在台北二二八和平公园，成立了“台湾人民失业联盟”，举办自救演讲会，与会者普遍对执政当局的近期作为表示不满。但处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灾难中，一个自发的民众组织，除了互相给予一些安慰之外，又能真正改善些什么呢?

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全球各地的失业者们不惜付出种种辛苦，想尽一切办法。现年49岁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约苏亚·珀斯基，从2007年12月开始失业，尽管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但好几个月来未能在纽约再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现今华尔街的工作机会相当稀少，为了节省生活开支，珀斯基的妻子辛西娅已经带着他们的几个孩子返回了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老家生活。

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心灰意冷的珀斯基日前竟然“放弃尊严”，脖子上挂着一块推销自己的牌子走上纽约街头，希望能通过这种“毛遂自荐”的方式帮自己找到一份工作。

挂在珀斯基胸口的牌子上写着“经验丰富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等你雇佣”的字样以及他的联系方式。珀斯基身穿自己最好的一套西装，选择了一个每小时有数百人经过的繁忙路口“推销自己”，他在盛夏的烈日下挥汗如雨，可为了找一份工作，这点辛苦算什么?

当华尔街的精英都已经举着牌子上街找工作时，普通的芸芸众生又将面临什么呢?

挂牌找工作已经不是少见的“奇闻”、“新闻”，不久前，另一位美国年轻人也被记者拍下的举纸牌找工作的画面，纸牌上面写着：“拥有博士学位，完成了三个博士后研究，发表了6篇论文，寻找糊口的工作。”

每一次失业，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雷尔·马什的经历就是如此。她本是加拿大多伦多一家企业的职员，失业那天发生一件事，在她的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半年之中，她再也没有吃过自己最心爱的雪糕。

2008年4月底，雷尔和同事收到公司邮件，通知他们出席一场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却是被告知：他们的岗位是多余的。可能是作为一种安慰和补偿，会议结束后，总裁邀请雷尔和其他失业的同事一起去吃为五朔节准备的雪糕。5月1日是英国的五朔节，由于加拿大是英联邦成员，所以也过这个节日。虽然雷尔平常最受吃雪糕，但在那一天，失业的沮丧心情使她完全没有了胃口。

灾难不仅仅属于别人（2）

接下来的两天，雷尔和同事“照常”上班，但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他们孤零零地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人跟他们说话。雷尔忍不住冲进人力资源总监的办公室，质问道：“既然不让我们干活，为什么我们还要呆在这里？”

人力资源总监回答道：“啊？我以为你们有事情可以做。去问问你的主管，如果可以，你们就回家吧。”

接着，主管流着泪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做什么，但你们可以回家了。”

于是，雷尔和同事们一起收拾好东西，默默离开公司。从那之后，她再也没有吃过最心爱的雪糕。

失业是辛酸的，但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报以更多的乐观和坚强，去面对，去奋争。当遭受失业时，要优雅地去接受它。而后，绝不低头，用更多的努力同不幸宣战！

然而，根据那些有过失业经历的人们的体验，不管事先有多少心理准备，一旦那个倒霉时刻来临，真实的情感也许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控制的。

也许我们觉得自己不会失业，我们能力强，客户非常喜欢我们，老板器重我们。几个小时之前，客户还和我们相谈甚欢，但谁能料到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被解雇了呢?

或许我们想象过自己有失业的一天，也许半年来我们无数次在脑海中彩排过，自己如何落落大方地离职。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我们要面临的心理考验仍然大大超过了想象。

在被告知由于公司业绩下降和经济形势的逼迫，我们所在的职位不得不取消时，我们要强迫自己淡然微笑，点头表示理解。我们要同每个留下来的幸运同事握手，对他们说我们喜欢和他们共事，也喜欢

这份工作，并为在这家公司服务，代表这个品牌而自豪。这些听起来很有“面子”的话，到了那时，可能我们一句也说不出来。

眼泪往往是不听话的。到了那时，我们只能从一间办公室走到下一间，藏着眼泪，在一份份文件上签名。也许留下的同事们在同情地望着我们，他们也仿佛为我们心碎。

也许我们剩下的只有一份不屈的决心：到这个城市或者一个新的城市中，去找到一份新工作。不管怎么，我们都有带着尊严去寻找工作，同时，也为了找回更多的尊严。

这时，我们会记起法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帕斯卡（Pascal，1623-1662）的警句：“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他的全部尊严来自于思想。”

是的，该发挥我们的思想了！到了该多进行一些思考的时候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我们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失业？而失业这个灾难，当然不仅仅是别人的事，某一天，它也许会落到我们头上。

如何才能准确预判，我们是不是被列入下一批裁员名单？如何才能早有准备，找到好工作，稳坐职场，决不失业？如果真的失业了，该怎么渡过这段时光？该如何把不幸转变为机会？我们该为自己多考虑一些了……

中国，不能回避的现实（1）

中国，不能回避的现实

在世界范围内，每次经济危机，往往是以前所积累的矛盾的总爆发，是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

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生产过剩和低工资，每8~10年就发生一次生产过剩型的经济危机，大量资本家破产自杀，工人失业，经济滑坡，经济发展速度受消费增长的限制，发展缓慢。

也正因如此，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是高速的。有数据显示，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过近一百多年的发展，但到1820年，发展速度仍明显低于中国。中国到1820年，GDP仍然占世界的32%，大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和美俄日之和。即便受到战乱和国外的侵略掠夺，经济发展缓慢，但到1890年，中国的GDP还和美国相近。

西方国家的高速发展，其实始自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1882~1945）实施“新政”（New Deal）之后。当时，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提高有效需求和民众的消费能力，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带来的失业问题。据此，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大量国家财政投资于公共设施建议，吸纳失业人员就业，并制定最低工资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提高消费能力，应付当时的经济危机。

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以国家的政策干涉刺激经济发展。同时，在新技术革命的助推之下，西方国家都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不仅经济增长迅速，生产效率大增，而且劳动者福利优厚，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然而好景不长，不恰当的“干预”伤害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筋骨，如同不断地向一个肌体注射补药，不但肌体无法吸收，还造成了“虚火”过旺和内脏不堪负重。从20世纪70年代起，形成了高通货膨胀与高

失业率伴生的新的经济危机形式——滞胀，主张恢复经济本来活力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国经济政策一直在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线中徘徊着。然而，种种对策之下，又引发种种新的经济问题，自然也伴随着一波波失业问题。发展到21世纪，失业仍然是世界经济的难解谜题。直到本次金融灾难把全球引向一次空前的经济危机，失业，再次成为全世界的又一次巨痛。

作为一个经济结构发展不均衡的国家，中国所面对的失业问题，比任何国家的失业问题都更为复杂，它浓缩了从工业革命时期到现代福利国家的种种失业“标本”，也涵盖了包括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技术性失业、资本性失业等一切经济学家们所归纳出的失业类型。

我们不仅要面对西方国家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一切失业类型，我们还要受制史无前例的新经济环境。我们需要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寻求答案，我们也需要灵活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环境。失业，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中国，不能再回避失业问题了！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失业总是有所隐讳。我国政府向社会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它只反映我国一部分失业问题，而非全社会的真实失业率。我们甚至对“失业”这个词语讳莫若深。“文革”结束后，大量从农村返城的“上山下乡”青年没有工作，他们被时代赋予的特殊身份是“待业青年”；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大批城镇职工失去原有的“铁饭碗”，他们被称为“下岗职工”。实际上，他们都符合国际惯例的“失业人口”定义——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工作能力却没有工作、要求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

近年来，严重的失业问题隐藏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外表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普遍存在的“无就业增长”问题，在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一困境来源于中国制造业过度依赖出口的畸形发展。不仅如此，长久以来，中国的GDP保持在10%的增长，而这是要靠基础设施建设

来拉动的，因此导致部分产业过冷和过热，过热的行业如钢铁、水泥等每年增长率都保持在30%以上，而很多制造业的实际利润和薪水实际增长率大多呈负值，民营经济则得不到国家的足够重视。

中国，不能回避的现实（2）

结构不合理，制度不完善，各种不平衡不合理的人为因素干扰经济的正常发展。“制造业大国”的桂冠下隐藏着结构性失业的问题，造成了继“待业青年”、“下岗职工”之后的第三波失业大军。他们是新成长的劳动力，是刚刚走出校门的高校毕业生和刚刚走出乡村的务工青年。中国需要同时完成城市化和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才能容纳这些新养成的就业人口。而一旦遭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经济受到的可能就是深重的内伤。

以上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失业问题变得格外复杂。

拉动内需可能解决一部分行业的就业问题，但“政府失灵”很可能扩大贫富差距、造成财富进一步集中，加上大量失业人口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又该如何创造有效需求?

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再回避失业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显然要比其他国家付出更多的研究和思考！

为了弄清人类因何不得不长期面临失业问题，弄清各个历史时期的“世界工厂”们，在其养成阶段该如何“与失业共舞”，弄清人类为什么要工作，怎么才能更好地工作、更幸福地生活。为了弄清这一切，我们首先要从历史上寻找答案，这样便于我们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一步一步地分析和推演。

接下来，我们将从一个个真实的历史画面中，发现很多“似曾相识”的场景，发现很多被掩盖的真相，并从中寻找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要知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失去土地，失业的开始（1）

心情定义：苦难

糟糕指数：★★★★☆

蒸汽机的发明和发展，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极大地解放出来，改变了人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状态。但是蒸汽机这个冒着黑烟的钢铁恶魔，也带来了高效“屠杀”和污水废气，更带来了失业。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大工业时代让人类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由。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或者一个组成部件。当规模化生产最终抛弃人力的时候，失业就产生了。

工业革命时代，对普通劳工来讲，绝对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当然，也正是从那时起，人类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工人。于是，失业现象就开始存在了。

工业革命时代是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就连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家，也不能否认那一时期工人的境遇是多么糟糕。失业、极低的工资、过长的劳动时间还有恶劣的劳动环境，是工业革命时代不能回避之痛。

那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往往对失业的研究并不深入，经历了一次经济危机之后，他们依旧信任“看不见的手”。而失业与贫穷引发了人们思索，由此产生两种解决路线，并将其影响扩展到20世纪。一个思路是摧毁现行的世界，这是工人运动及后来的共产主义思潮。另一条思路却致力于完善这个世界，并开始着手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前者是后来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基础，后者则是后来福利国家的基础。

失去土地，失业的开始

人类最初的失业，是从失去土地开始的。而失去土地的原因，在于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

我们从教科书上所熟知的圈地运动，一向被称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破茧而出”，它“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为资本主义提供自由劳动力，为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而实际上，圈地运动也代表了一种“外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的发展历程，而这种古老的“外向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就是纺织业。

在15世纪以前，英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纺织业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业。但是，当时间跨入“大航海时代”，一切都不同了！

这时，欧洲各国的人们都兴奋地发现，大洋的另一边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未知世界。君主们想寻求“新世界”来扩张其领土，探险家们则希望能找到金、银、香料及种种珍贵物品，而商人们则希望开辟新的贸易航线积累财富。到了这时候，英国人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那普普通通的绵羊，竟然是上帝慷慨施予给他们的一份厚礼。羊毛，一旦与航海业结合起来，就能创造英国巨大的外贸优势！

此时的欧洲人，早已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使用罗盘，并把它改造成“星盘”以帮助水手寻找他们在海上的位置。自从有了星盘之后，航行业大为发展，于是，英国的羊毛成了国际贸易中的抢手货，开始影响着整个英国的繁荣。而外贸的迅速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纺织业的发展，促使羊毛价格不断上涨。

失去土地，失业的开始（2）

在此之前，没有人会想到羊毛会这么值钱。养羊成了特别有利可图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对于英国的富商们来说，只有手里有了足够好、足够多的毛织品，才可以和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零售商们讨价还价。所以他们从海外赚钱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出大把的金币，养羊，办工厂，织羊毛。

这时候，对土地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谁对土地的控制能力越强，谁就能养更多的羊，谁的潜在收益就会越大。于是，贵族们开始了“圈地运动”，首先就是占用英国的公有土地。近年来，对于国内出现种种非法占用农业用地的现象，媒体上常常讽刺为“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并进行抨击。其实，两者确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对公有土地的非法占用。

中世纪欧洲的土地公有制称为“敞地制”。即封建领主的自营地和农民的份地都分作春种、秋种和休耕三部分，凡休耕的都作为牧场，都必须将田界上的篱笆、栅栏拆除，供公共使用。在“圈地运动”出现之前，英国的乡村本是一片宁静的田园风光。著名诗人哥尔斯密曾经在其诗歌《荒村》中写道：

曾多少次，我在你那种种迷人的景色前停留

甜美微笑的村庄，草地上最可爱的村庄

这片土地正在遭遇厄运，它是来势凶猛的灾难下的牺牲

财富在积累，人口在凋零……

这些悲伤的诗句形象地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这场著名的“圈地运动”之后，英国乡村生活逐渐永别了自然经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闲逸安适，人们谋生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旧式的村落不再存在，机器轰鸣的城市和集约化生产的农场粉碎了旧日的田园美梦。曾经的诗意，将永远成为历史。

英国的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先是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自耕农的土地。自然，公用草地由于过度放牧而退化，而贵族如果通过与农民谈判的方式达成共识，交易成本又太高。最好的办法，是利于特权，实现土地的私有化。

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当年，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

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他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他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以保全。

一开始，圈地运动确实被国王和政府看作是私人的暴行，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禁止圈地的法令。然而，很快国王就对圈地运动抱默许的态度了，这与当时王室与教会的关系是不分开的。16世纪，教会约占有全国土地的l/3。英国国王为了增加王室收入，同时也是惩罚教会对于王室干预过多的行为，封闭了数以千计的修道院，没收了他们的领地。这些领地一部分被国王赐给了宠臣亲信，一部分廉价卖给了乡绅、土地投机者、商人和牧场主。这些人再次以圈地形式把教会领导下世世代代耕种份地的农民赶走，建成大牧场、大农场。

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资本家和王室渐渐达成新的利益共识，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到18世纪，圈地开始变成经过议会法令批准的“合法”行动了。这种“合法”的圈地活动到18世纪中叶以后更加肆

无忌惮，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英国的圈地运动从15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全国一半以上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

在当时，对于那些只拥有20亩以下土地的农民来说，圈地对他们无异于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自耕农是指拥有耕地不到100 亩的农民，以20亩为界把他们分为上下两层。其中占地20~100亩为小农的上层，在圈地运动中并没遭到巨大损失，反而抓住机遇摆脱了自耕农身份。20亩以下的小农，由于自己拥有或租种的土地太少而无法自足，所以他们依赖于对公地和荒地的使用权。土地越少，相对的圈地费用越高，与其为小块土地负担圈地费用，还不如把土地卖给大土地所有者。但即使变卖也发不了横财，反而永久的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

他们就这样“失业”了。此前，土地和农作物就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产业，他们不需要“就业”，也没有“失业”的概念。如今，失去土地的农民只得在贵族的畜牧场或工厂中做工，大多数人由此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凭工作吃饭的时代到来了。

显然，当时国王没有站在普通自耕农的一边。为了使被驱逐的农民尽快安置下来，英国国王在颁布限制圈地法令的同时，也限制流浪者，目的是让那些从家园中被赶出来的农民，去接受一种前所未有的谋生方式，我们今天称之为“打工”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些类似中国上世纪所说的“盲流”，但他们面临的法律制裁是今天难以想象的野蛮和残酷。

当时的国王规定，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仅仅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就处死过大批流浪的农民。

圈地运动在英国发生得最早、最具代表性。整个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则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德意志、法国、俄国和丹麦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法令实行的。捷克和波兰在1918年以后也出现过圈地运动。

于是，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农业不再成为社会的主流，城市、工厂、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断积累的社会财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找工作、做工、失业、流浪、迁移等等围绕工作的一切，成为了这个光荣而艰辛的时代中普通百姓的生活主题。

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1）

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

“圈地运动”造就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这种强资本、弱劳动的不对称格局，必然导致当时极高的失业率。

这种情况类似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其原始资本积累还没有达到一定水平，处在城市化进程没有完成的时期，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很难保证长期稳定的就业。

从理论上讲，在“劳动无限供给型失业”之前，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经常处在失业与就业之间，就业的时间不足，经常在非正规部分打临时工，就业缺乏起码的稳定性；就业的工资报酬极低，经常处在最低工资标准之下。所有这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半就业、半失业群体，称之为“就业不足”或“不充分就业”。

而在几个世纪前的欧洲，情况也是如此。由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手工工场主能接纳的劳动力有限。为了节省成本，他们显然愿意雇用最少的劳动力，令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给付极低的工资，而不愿意增加用工人数。

“圈地运动”造就了大量没有土地的失业或“半失业”人群。为了生存，他们只能选择流动。然而，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城市化缓慢的年代，他们往往是被禁止流动的。当时英国对“流浪者”的禁令，显然是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于是，这种劳动力与城市博弈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城市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劳动者。

所以，城市的发展与圈地运动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城市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导致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这就要求改善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于是加速进行圈地。而圈地的加速，又把越来越多的人口推向城市。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在《乌托邦》一书中的那句名言早已众所周知："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所欲无多，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住宅和城市。"其实，一味对圈地运动持有偏颇、仇视的态度，却是有违历史事实的。英国的历史学家往往以工业革命为界线，将圈地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6世纪的"羊吃人"阶段和18 世纪圈地合法化之后的"议会圈地"阶段。这两者之间的显著区别是：

——前者主要是由耕地转为牧场，后者主要是从牧场转为耕地以及开发荒地、林地等；

——前者并未带来技术上的进步，仍然是一种粗放经营，后者促使农业管理、技术水平出现了一次飞跃；

——前者因为使农村人口减少而声名狼藉，后者却与农村中一次前所未有的人口快速增长同步。

18世纪以后的晚期圈地运动，即"议会圈地"，才是更典型的圈地运动，对社会发展更具深远的影响，它规模大、范围广，促进了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产生。圈地运动的过程中，人们在农村引进新作物，改良畜种，改进耕作制度，改善排水系统，改变租佃制度，尤其是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由此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诸如筑篱、修路、人工种植牧草等，从而造就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农业，为更多农业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与此伴生的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18世纪中后期，英国从事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商业和家庭服务业等众多行业的人口逐年提高。

纵观圈地运动直至工业革命的整个阶段，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农民为了活命被迫来到手工工场出卖血汗。其实，城市本身对农民是有吸引力的，它意味着更高的收入、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更为体面的身份。城市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于是大量农村人口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都向城市迁移。其次，城市救济水平比农村高，很多农村的贫困者

流向城市希望得到政府的救济。而且，城市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娱乐设施等等，对生活单调的农民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在16~17世纪，迁移进入城市的人群，主要是商人、工匠和青年女性。他们迁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多的生活资料，迁移的距离较短。而英国劳动力流动最稳定、规模最大的时期是从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开始的一大批人口涌向城市，并永远不再回归乡村。

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叶，英国的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英国的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1760年，英国5~10万人的城市只有一个， 1851年，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7个。新兴工业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如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

在圈地运动早期，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被禁止流动。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圈地动动中，政府和王室修改了过去限制人口流动的法律制度。其中，1846年《贫民迁移法（修正案）》的颁布，使一些贫民不再被遣返原籍；1865年议会通过的《联盟负担法》，扩大了救济贫民的区

城市，工作与解雇同在（2）

域范围和贫民居住地范围，不再限制定居地。

这也是城市真正敞开怀抱，吸纳愿意在它的领土上寻求机会的人们。英国经过了恐惧、限制农村剩余人口流动的阶段，终于意识到，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流入城市，为它服务。

相比之下，中国在上世纪末，也经历了一次对农民工从拒绝、排斥到接纳、引导、帮助的过程。从起先的视农民工为“盲流”，因恐惧他们为大城市带来的压力而主张“就地安置”、“离土不离乡”，到认清只有大都市才是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这些，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人们主动适应、主动探索的表现。

而在当时的英国，涌向城市寻找工作的不仅是贫民，还出现了所谓的“中间阶层”。

早在17~18世纪，英国就已经较早地发展成为一种以“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为主体的新的社会结构。而“中间阶层”既包括大商人、大企业主、银行家、政府官员、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也包括店主、小贩等手工业主。他们无论在人数上还是收入上都占绝对优势，并且大多数居住在大城市或内地城镇。

当时的英国由于贵族爵位和地产实行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势必要离开家族另谋仕途或经商，成为中间阶层。在中间阶层的上层，个别人也可以凭借资本实力购买土地和爵位，跻身于贵族行列。

这种特有的“土地贵族—中间阶层—工资劳动者”社会结构便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与社会开放性相联系，这种结构的社会流动性也较大，由于工资差别、圈地运动、乡村工业的发展及其不平衡性造成了社会的区域流动，大量农业区的农民不断流向城市、集镇和工业区，这种职业流动是现代城市化环境得以形成的内在要素。由此可见，英国的这种独有的三层式社会结构以及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正是工业革命产生及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社会因素。

不过，那个时代的工人的生活境遇是极差的，失业更是不能避免的事情，正如恩格斯所说，“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工业革命时期，一边是刚刚脱离土地的劳动力“不充分就业”，另一方面是已经就业的工人工资十分低，且工作环境差，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其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工场主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往往以更微薄的工资雇佣童工。在1835年英国棉纺织厂的21.9万名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其中那些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三四点钟就被从肮脏的床上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像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75%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历史学家们写道：“因为在早期不断受到大量煤烟的熏染，那些新兴城市的居民聚集区都变成了黄褐色的地方。由于中部地区缺乏足够的阳光，这些居民聚集区无论何时都是黑沉沉的。工人们居住在仓促建造的简陋住房里，许多人全家挤在一间房里，家庭生活趋于瓦解。格拉斯哥市的一位警官说，这个城市里有成片成片的平民住宅区，每个住宅区都聚集着上千个衣衫褴褛的儿童，他们只有教名，通常是诨名，用他的话说，“就同畜生没有什么两样”。

在许多新建工厂里，劳动机械化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工厂主宁肯使用年仅6岁的童工或女工。他们的工资比较低，他们通常善于掌握一个线轴的工作。工厂里的工时很长，工人一天要工作14个小时甚至更长。除了被解雇而闲得发慌外，工人的假日是少有的，而失业又是常见的灾难。工人一天无工可做，也就一天生活无着。

帕尔墨和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说：“对英国劳动人民来说，工业革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经历，但是应该记住，低工资也好，

妇女和童工的使用也好，失业的痛苦也好，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存在了好几个世纪。”

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发展成为具有雄厚实力的“世界工厂”，英制产品遍布全球，创造了“大英帝国日不落”的辉煌。英国的城市也得益于此而迅猛发展起来，将广大劳动力疯狂吞食，作为“世界工厂”的祭品。

城市，吸引着无数需要工资、需要谋生的人们。在工业化的早期，城市，既是劳工们新的希望所在，又是一场新的灾难。那是一个有工作也会被解雇的地方，那是一个有钱挣又要忍受劳苦的地方。

在城市的种种“祸害”当中，机器是一个特殊的角色，至少，在当时也被急需工作的劳工们看作是一个恶魔。

机器真的抢了人的饭碗（1）

机器真的抢了人的饭碗?

关于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后，究竟有多少种机器方面的重大发明，下面的列举可见一二：

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1778年，约瑟夫·勃拉姆发明抽水马桶。

1796年，塞尼菲尔德发明平版印刷术。

1797年，亨利·莫兹莱发明螺丝切削机床。

1781年，詹姆斯·瓦特改进了蒸汽机，现代蒸汽机成型，并于1785年投入使用。

1807年，富尔顿造出用蒸汽机做动力的轮船。

1812年，特列维雪克发明科尔尼锅炉。

1815年，汉·戴维发明矿工灯。

1825年，斯蒂芬森发明蒸汽机车并试车成功。

1844年 成廉·费阿柏恩发明兰开夏锅炉。

……

这些令人激动的发明，很多在当时不仅不被人们欣赏，甚至可能是广为人们所仇恨的。机器的使用增强了劳动生产率，资本家可以雇佣较少的工人，完成更多的工作。于是失业的工人把科技进步和机器的发明看成是罪魁祸首，他们在殴打厂主的同时，还焚烧厂房，捣毁机器。

1765年，珍妮精纺机刚一投入生产就被工人捣毁；1779年，更先进的水力纺纱机出现时，也被几千名愤怒的工人捣毁，发明家阿列莱也被工人惩罚。英国当时还涌现出了一个名叫鲁德的捣毁机器的工人领袖，专门带领工人捣毁机器，后来人们还把这个运动称为“鲁德运动”。

机器真的会抢了人的工作吗？这个问题，引起了当时学者们的兴趣，他们还对此展开了广泛的争论。

其实，对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失业问题，19世纪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萨伊、西斯蒙第、李嘉图、拉姆塞、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等。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如果工资可以随劳动力供求变化而自由涨落，便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使一切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资源都被用于生产，实现充分就业。

也就是说，只要工人愿意按现行工资率受雇于雇主，都会有工作可做，不会存在“非自愿性”的真正的失业。比如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Pigou，1877~1959）认为，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率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由于转业或择职而导致的暂时性失业。

然而当时的经济学家对失业问题远不如他们对货币问题那么感兴趣，他们的争论，很快就局限于机器与人的关系上面了。

一派学者主张“机器转起来，工人忙起来”的观点，如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他早期关于机器与失业关系的理论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认为机器的使用与普及，不会导致工人的失业，工资也不会因此下降。也就是说，技术进步一方面破坏旧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为此，古典经济学家们还提出了著名的“补偿理论”。他们认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这些补偿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得因技术进步而被排挤的劳动力可以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些补偿机制包括：

●新机器补偿机制。某种导致工人被排挤的技术进步必然要求有新机器出现，这将在生产这种新机器的资本部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价格下降补偿机制。技术进步在导致工人被排挤的同时，也会使得生产的总成本下降；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这将引起价格下降，需

求因此而增加，产出和就业也因此而上升。

●新投资补偿机制。如果价格下降补偿机制中所提到的成本下降与价格下降不是同时发生的，则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会获得额外的利润。这些额外利润将被用于新投资，从而创造出新的产出和就业。

●新产品补偿机制。技术进步还可能以新产品的发明及其商业化的形式出现，这时就会出现新的生产部门，从而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

●工资下降补偿机制。如果一种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变得过剩，工资便会相应下降，生产者可以通过开发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减少成本，增加利润，这样，过剩的劳动力便会被吸收。

机器真的抢了人的饭碗（2）

当时，经济学家萨伊（Say，1767~1823）创造了著名的“萨伊定律”（Say"s Law），完全否认技术进步会导致长期失业。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采用新机器所导致的产品供给增加，会引起产品需求的增加。产品需求的增加，最终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使得被新机器排挤的工人重新获得就业机会。

而主张“机器导致工人失业”学者，相比之下，则为少数派。马尔萨斯认为，机器的应用会与需求不足、资本短缺等因素共同作用引起失业。但他同时又指出，开放的市场可以恢复充分就业。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后来有所转变，他认为，如果机器占用了流动资本，则会出现严重的就业问题。巴顿在《影响社会上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现实条件的考察》一文中提出了“机器驱逐工人，造成人口过剩”的理论。

机器是否真的抢了人的饭碗？且不论争论的结果最后如何，工业革命毕竟是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了。

在英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大量的发明创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斯蒂芬森发明并由瓦特改进的蒸汽机了。

蒸汽机的伟大，在于它促进了“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工具相结合，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能力，从而显著提生产效率，而精密的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蒸汽机，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蒸汽机几乎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轰鸣的机车如同一个不会说话的“老板”，要求人们按它的步调工作。工人们通过它也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当一位工人操纵手柄，驱使一部部沉重庞大的“钢铁家伙”生龙活虎地运转起来，那种自豪感，也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给予的。

蒸汽机还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为人类提供了快速、廉价的交通工具，也为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最

终迎来了一个跨时代的改变——在铁轨上行走的火车出现了。

仅1832年这一年，美国就修建了17条铁路。蒸汽机车也在这一年前后有了很大的改进，从最初斯蒂芬森建造的两对轮子的机车，一直发展到5对，甚至6对轮子。吐着蒸汽的钢铁巨龙，与人们为了工作的大迁徙结合起来。它载着人们，冲向一个个新的职场，为了对抗失业，为了谋生，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更好的机遇，人们不断迁徙，不停奋斗。

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有关“机器是不是失业元凶”的讨论一直进行了下去。“反对机器”的运动，也总是陪伴着工业革命的每一个进程。贝尔的电话无疑是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之一，然而，贝尔的电话发明专利权却经过600多场官司才最终确定下来。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曾被怒气冲冲的列车长赶下火车，并把他的所有实验装置扔在了站台上……

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有关“机器与工人”的问题又引发了两次争论的高峰，并且随之出现了“技术性失业”这一概念，意指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

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梅多斯提出了“技术失业论”。该理论认为，随着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使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必然要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梅多斯还提出了“零度增长”的概念，他主张，要解决失业问题，有必要放弃经济增长。

与此相对的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西方经济学家依然坚持“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工人大量失业”的结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鲁克斯认为，技术进步不仅可以节约活劳动，而且也节约了能源和原材料。与劳动力价格相比，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更高。如果把节约的物质资料用于其他方面，就会创造更多的产值和就业岗位。如果说技术进步还是会产生排斥活劳动的现象，那也只是一种结构性失业。而美国著名的经济专栏作家亨利·黑兹利特则这样写道：

在所有的经济错觉中，“机器必然导致失业”这种错误最为阴魂不散。这种错觉曾经被无数人驳倒过，但总能死灰复燃，并且和以往一样张狂。每当出现长时期失业潮的时候，机器总是被指责为造成失业的罪魁祸首。这一谬论仍然是许多工会组织开展实际运动的理论基础。而公众则普遍容忍这些做法，要么认为工会做得对，要么是稀里糊涂，搞不清工会错在哪里。

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以为毁掉一切机器，或者停止新技术的研究，就能解决一切失业问题。而在19世纪，这种关于失业的早期争论，把人类引向了两条道路：共产主义和福利主义。

走与留？饥寒交迫的奴隶（1）

在早期的工人运动领袖和思想家那里，工人被比喻为新的奴隶，资本家的奴隶。面对当时恶劣的工作环境、过长的劳动时间、失业的风险，工人的反抗也从最初的“闹事”发展为有组织、有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直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进程。

从19世纪以来，经济危机几乎是欧美国家的家常便饭。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经常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均与经济危机有关，甚至可以说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直接产物。

经济危机造成了生产力倒退、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等问题。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照顾穷苦百姓的基本生活，拉动内需，增加就业。这是西方国家发展史上常用的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也是后来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萌芽。

早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中，法国的临时政府就曾成立国立工厂，当时巴黎加入国立工厂的失业或无业人员曾多达12万人。不管他们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们都参加修桥铺路、扫街种树等工作。法国临时政府还通过了一些规定，如不超过10法郎的典当物品均归还主人（这种物品一般都是贫苦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废除中间包工，劳动时间减少一小时（巴黎减至11小时）等。此外，还规定取消零售酒税、废除因无力付清债务而产生的民事拘禁等。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尽可能使普通工人和小产业所有者能够生存下去。

此类措施，伴随着日后的历次经济危机而逐渐发展起来，而最典型、最成熟的举措，则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中。其实，也正是这些早期的“国家干预”措施，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营养和温床。

同时，当时的各国政府也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增长点有时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有时通过企业或发明家有意无意的创造来实现，但也有的时候是偶然发生的。

1848年，整个欧洲似乎都陷入了革命的漩涡当中，当时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曾认为，最先进国家的工人有可能通过革命取得政权。但不久后他发现，资本主义却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浪潮。其主要原因，是1848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1850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都发现了新金矿。正是这两个金矿的发现，使1848年的革命高潮迅速衰退。大批失业工人和谋求发财的人潮水般涌向这两座金山，从而使欧洲变得“安全”起来。同时，由于受到黄金的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长达10来的新一轮繁荣。马克思曾就此评论道，1848年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

而对当时的失业工人来说，移民是一项重要的选择。其实，不管是跨越城市与乡村的迁移，还是跨国境的移民，其主要动力都一样，要么是避免失业，要么是寻找更加优厚的收入。早在1824~1825年经济危机期间，就有大量欧洲失业工人出国谋求生计，人口外流的数目大增。而美国金矿的发现，使得移民美国的人数逐年增加。此时，美国也因国内建设需要，改变了限制移民的政策。1848年欧洲革命后，移民美国的浪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就像刻在美国自由女神像底座上的一首诗写道的那样：

你们这些疲惫不堪、穷困潦倒的人，

你们这些蜷缩在一起渴望呼吸自由气息的人，

你们这些被富饶海岸遗弃的可怜的人，

你们这些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

投到我的怀抱吧，

我在金门之侧高举着明灯！

从1820年到1920年的100年间，美国一共接纳了大约3 350万移民，形成美国持续百年的移民潮。欧洲失业移民移向北美大陆，促进

了美国的强大，使之取代英国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

走与留？饥寒交迫的奴隶（2）

19世纪末的美国移民及其后代，也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挑战。第二次产业革命浪潮推动下的机器大生产，开始需要劳动工人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并驱动城市扩大，农业人口被迫向城市迁移。因为缺乏基本教育，移民的后代和农业转移人口在机器大生产的社会中始终处于底层。统计数据显示，1890年一个蒸汽机工程师一年的薪水有5 000美元，而一个煤矿童工每天的劳动所得只有8便士，还有很多移民没有工作，终日流落街头。

20世纪的美国，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时代的创伤催生了职业规划咨询的雏形：一个叫做帕森的中年人，在1908年设立了“波士顿职业局”，有系统地协助了将近80名求职者。同年8月，帕森不幸逝世，幸运的是他的咨询方式被传承下来。移民的大潮与失业的磨难，最终使得现代职业指导应运而生。

总之，人口的流动，正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无论哪个时代，职业环境的变迁总是与人口流动息息相关的。

在工业革命时代，除了移民之外，不堪忍受贫穷的工人们所剩下的选择还有一种，那就是发生暴动。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人运动走向成熟，他们成立工会，采取联合的有组织的行动，争取改善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伴随着共产主义思潮的出现，工人运动进一步政治化，比如英、法、德等国工人，就开展了独立的政治运动。其中最著名就是法国里昂丝织工人的两次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那么，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有产阶级”以及“替资本家说话”的政府，对此会坐视不管吗？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铁血首相的甜蜜“糖果”（1）

铁血首相的甜蜜“糖果”

一向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德国首相俾斯麦（Bismarck，1815~1898），竟然为世界贡献了影响深远的社会保险制度，这可谓是大大出人意料了。而俾斯麦这位“铁血首相”之所以“手软”，却是因为受到14世纪的一个意大利商船队、17世纪遭受火灾威胁的德国酿酒业以及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鸦片贸易的启发。

其实，意外的背后，总是有很多“必然”。贫富分化是工业革命的必然副产品，因此，各国政府必然都会尝试救助贫困和失业人口的相关措施。早在1572年，英国就开始征收“济贫税”。1601年，英女王伊丽莎白颁布《济贫法》，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尝试通过立法的形式解决社会底层的贫困问题。

19世纪中后期，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成长期，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理论也纷纷应运而生了。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者们，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最低生活标准”这个概念。而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塔诺等人，则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强调和证明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俾斯麦这位“铁血首相”，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出场了。他不仅促进了德国的统一，也促成了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成。

俾斯麦生长于贵族世家，在1862年成为普鲁士的首相兼外交大臣。他就职首相后，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中，就坚定地说：“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从此，强硬的俾斯麦被冠上了“铁血首相”的绰号。

当时的德意志是一盘散沙，拿破仑三世甚至嘲笑德国“无非是一架拆散了的蒸汽机”。但是，俾斯麦用自己的双手将这个蒸汽机完美地组装在一起，并且引领着这台蒸汽机高速前进。1871年，俾斯麦通过战争统一了德国，而国家的统一，也意味着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开始。

此时，德国的社会结构存在着诸多不协调之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阶级矛盾开始激化，而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个年代开始广泛传播的。俾斯麦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者”，他必须要压制工人运动。然而，只是单方面对工人运动采取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还要削弱工人的反抗意识。

与此同时，欧洲的商业保险也开始发展起来。保险最早起源于14世纪的意大利。据说有一天，一个聪明人在河边散步，恰好看到有10条船正整装待发。突然起风了，河面掀起了波浪。有人提出晚一天再出发，有人却害怕耽误了航程。双方正犹豫的时候，这位散步的智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让每个人把自己的货物都分成十份，分别装在十条船上，然后出发了。几天以后，回来了九条船，一条船被风浪掀翻了，每个人仅损失了十分之一的货物。这位智者抓住这个商机，开了一个买卖，从这个码头起航的每条船都向他交纳一定的费用，而他承诺交纳费用的船在航行中万一出现事故而导致的损失，由他包赔。这就是现代保险公司的雏形。

德国也是“保险意识”很强的国家。16世纪末，德国汉堡的酿造业者成立了火灾合作社，凡加入的社员遇到火灾后均可从合作社得到资金。1676年，由46个合作社合并成立了汉堡火灾保险局，这便是公营火灾保险的始祖。1805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贸易，由该公司的鸦片部经理发起，在广州设立了中国第一个财产保险公司。

到了19世纪，欧美的商业保险业已经非常发达。而俾斯麦正是从商业保险中获得灵感，来实现他对工人的“精神软化”，提供甜蜜的“糖果”。

1881年11月17日，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德国皇帝威廉一世颁布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险的皇帝诏书》。诏书宣布，工人在患病、发生事故、伤残和老年经济困难时应该受到保障。诏书还对社会保险的发展作出规划，确定职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救济等制度。此后，德国在1883年颁布实施了《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实施了

《工伤保险法》，1889年颁布实施了《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上述三项法规被汇总为《帝国保险条例》。

这些保险法规，都是借鉴了商业保险“风险分担”的原则。以《疾病保险法》为例，该法规定，雇主交纳保险金的1/3，雇员交纳2/3，雇员一旦生病，就能得到起码13周的免费医疗。《养老、残疾、死亡保险法》则规定，雇主、雇员和政府都要为保险基金出钱。

精明的俾斯麦，之所以采取企业、雇员、政府共同承担的办法，就是为了“分散风险”，缓解劳资冲突，同时也为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赢得机会。

铁血首相的甜蜜“糖果”（2）

俾斯麦一方面镇压工人运动，采取“铁血政策”，一次次血洗街头；另一方面，他用怀柔的社会保障政策，保证了工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这种做法，被称做“大棒加糖果”。俾斯麦的“糖果”，使德国实行了全世界最早的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养老保险，打下了德意志人民团结的坚实基础，而由此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使得德意志走上飞速发展的道路。直至今日，德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善的，并影响了很多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

在同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俾斯麦的“铁血”个性和他的“大棒加糖果”政策，无疑是一种“商人的品质”。

1867年的一天，马克思从汉诺威致信恩格斯，他写道：“昨天俾斯麦派了他的一名爪牙瓦尔内博耳德律师到我这儿来（不要告诉别人）。他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冯卞尼格先明天也要来访问我。”恩格斯则在回信中这样形容俾斯麦：

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我是料到的，只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快。这很能说明这个家伙的思想方法和眼界：他总是以己度人的。资产阶级当然能颂扬今天的大人物，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体现。波拿巴和俾斯麦借以获得成就的一切品质就是商人的品质：用耐心等待和实验的办法去追求既定目标，直到有利时机的到来；经常开着后门的外交；善于讨价还价；为了利益可以受屈辱；硬着头皮说‘我们决不骗人’，总之，在一切方面都是商人的气质。……如果探索一下这些大人物们的手腕，那么你总会感到是走进了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俾斯麦想：只要我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我终究会交一次好运的，那时我们就可以共同来干一桩好买卖。

两种信念，两种道路，在当时是不可能融合的。俾斯麦想利用一切知名人士“为德国人民谋福利”。他的“商人本质”在于，他有这样一个信念：既然工人需要福利，需要更好的生活，那么，国家可以给工

人福利，条件是工人不能再参加工人运动。在俾斯麦看来，要使工人循规蹈矩，就必须把工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必须以工人保护者的身份出现。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俾斯麦的高压与福利相结合的做法，使德国人的精神和文化上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19世纪，法国、英国不断进行思想的启蒙，而此时德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则相对愚昧落后。所以，到1890年之后，在德国呈现出一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人民精神状态的未开化。两者相结合，必然导致德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化的国家。

当德国发现它的经济已经很强大，它的军事已经足以征服任何一个国家，而全球市场已被其他列强占领时，未开化的国民心态就会告诉他们：去夺回世界市场，去发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都由德国发动，其实早在俾斯麦时代，就已经埋下了这颗种子。

但不管怎么说，俾斯麦创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效仿的对象。1905年，法国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挪威、丹麦两国也分别在1906年和1907年建立了类似于法国的社会保险制度。1911年，英国颁布了国民保险法，开创了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先河，后被一些国家效法，构成世界社会保险制度的主流。

今天，全世界有1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有40%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包括中国。俾斯麦创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了劳动者的生存境遇，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并为“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涌现奠定了基础。

像畜牲一样活着（1）

心情定义：噩梦

糟糕指数：★★★★★

1932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有一个教员问学生为什么不回家吃饭，她说“我家是轮流吃饭的，今天该我的弟弟吃。”她的弟弟让她帮忙照看他的小兔子，结果她却把兔子吃掉了。纽约大街流行这样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让人们从繁荣富裕的峰顶瞬间跌下穷困与拮据的深谷。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中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还没等人们明白过来，他们的生活便已如同噩梦！

经济萧条的利刃，无情地斩向所有人，它切断了富人的旧日幸福，更粉碎了穷人的生活和希望。至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失业了！他们这才发觉，失业和贫穷，竟然这么轻而易举地来到自己生活中，费尽力气也赶不走……

在这段噩梦般的日子里，几乎没有一人能逃脱贫穷和匮乏的灾难。每个人，无一例外地被抛向生活的底层。大萧条，是人类关于幻灭和苦难的一段永恒记忆。

大萧条也促使资本主义重新认识自己、修正自己。它是近代社会的死亡，也是现代社会的开始……

“像畜牲一样活着”

在众多的危机中，美国人特别把1837年、1872年、1893年、1907年和1929年这五次经济危机称为大萧条。尤其是1929年，这是最令人难忘的世界性大萧条。

1929年经济大萧条，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惨痛的全面衰退，其影响是全球性的。除美国外，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及澳洲均

在同一时间出现经济衰退。

以美国为例，这场大萧条对经济的摧残非同小可。1929年至1933年期间，美国GDP下跌了33%。整个美国一片混乱，到处都充斥着抱怨、咒骂和愤怒。千千万万的人生存困难，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有些地方出现了充满暴力色彩的抗议活动。

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已经无法应付这种局面，由于疲劳和发愁而眼睛红肿，意志消沉。有一位雕刻家曾形象地说："如果把一朵玫瑰花放在胡佛手里，它也会枯萎。"

至于与失业有关的统计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失业率升至25%，实质工资下跌42%，而一些学者估计的失业率则为30%以上。

1933年美国的失业者高达1 70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可想而知，当一个国家至少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失业时，经济和社会将是什么情景。

像畜牲一样活着（2）

记录美国历史的《光荣与梦想》一书，曾这样写道：“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牲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这一情景描述的正是美国大萧条时期的民生状况。

当时，人们要无休止地寻找工作，但总是毫无结果；储蓄无情地减少，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很多人流落街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关于失业者如何某生，1932年前后流传着很多真实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有人通宵守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门口，有人为了找工作步行900英里。在西雅图，因失业而领取救济的队伍排成4行，长达几条街。华盛顿州有人到树林里放火，为的是能让人家雇他当救火员。所有人找工作都难于登天，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失业者。

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沦落为流民。1932年，有200万美国人在四处流浪。他们无家无业，混迹于城市的广场、公园、铁路沿线，住在用木箱板或废铁皮搭起的“胡佛村”里。

男人们自己动手卷纸烟。孩子们到处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把两边缝接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分移到两边去了。甚至有一些家庭主妇终日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被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为了省电，每个家庭都改用25 瓦灯泡。许多人家把收到的祝贺圣诞的卡片保存起来，在第二年改寄给别的朋友。甚至还有人全家走进垃圾堆捡骨头和西瓜皮来啃。因为蛆虫太多，芝加哥市有一个寡妇在捡东西吃时总是先把眼镜摘掉，眼不见为净。

大萧条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它引起了整个美国的消沉、不满和怀疑。失业使得人们情绪更加冲动，思想更加激进，将近四分之一的无业人员都同意这种观点：“革命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情。”甚至有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对帮助他的社会工作者说：“这些日子，思考是危险的，请别烦我。”

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反饥饿游行，密歇根州的迪尔波恩市还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失业骚乱，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城市和农村不断滋生的骚乱，动摇着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助金大军，赞成专家治国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静坐罢工的农场假日运动，让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

最不幸的还要算美国农民。虽然经过了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当时农业人口仍然占美国人口的将近一半。美国的农业自一战后一直没有得到恢复，4 500万农民在1930年仍然没有室内管道、没有电。由于农产品价格惨跌，大量农场主破产。美国农场的总收入从1929年的60亿美元急跌到1932年的20亿美元。许多地方缺乏口粮，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罗兰叶、野葱、勿忘我草、野莴苣以及一些专给牲口吃的野草。

营养不良导致公众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人们推迟结婚和生育，失学青少年大量增加。由于现金短缺，父母们无法给孩子上学提供必要的衣服、日用品和书本。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财政匮乏，学校董事会被迫采用大量政策以维持学校在区域内的运营，学校的学期缩短了，教师们的薪水下调了。但这时如果能得到一个为期一学年（五个月）的从教工作，也是件幸运的事。

不仅仅是美国人要过“穷日子”，大萧条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在英国，于1929年6月开始执政的工党马上就遇到了向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发放“失业救济金”的问题，据说在当时的英国，“任何人找到工作的机会，都不会比爱尔兰抽奖中奖的机会多些”。1931年8月，工党政府被迫解散。在法国，左派也因大萧条的压力被迫下台，短期内总理相继换人。更引人注目、更决定人类命运的，是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由于希特勒能解决人们的失业问题，所以众多的德国人在一开始都拥护

他，却没有想到他们的元首会将德国带往另外一条道路。大萧条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至于大萧条的结束，有人说是罗斯福新政的功劳，有人说二战起到了作用。然而无论如何，这次大萧条给人们带来的“失业创伤”，成为永远不能平复的痛苦回忆。

“非理性繁荣”的代价（1）

“非理性繁荣”的代价

在19世纪，英国得益于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成为“世界工厂”。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利用自己的资源和欧洲的资金、技术，飞速向前发展，形成了以铁路带动的“新经济”，使“世界工厂”离开英国，渐渐向美国转移。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暴发户”。战争结束时，美国一跃成为各国的债主，从资本输入国变为资本输出国。20世纪20年代，美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加上欧洲大规模“战争订单”的刺激，以及美国式“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模式的兴起，美国经济稳步发展，取代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特别是1923—1929年的6年间，美国钢的熔铸量超过了英法德三国钢产量的总和，机器制造业增长了53%，汽车产量增长了36%；化学、航空、无线电和人造纤维等行业，其产量也比1923年增加了一倍；美国的对外贸易也超过了英国，占据世界第一位。

美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更自信、更乐观。这造成了美国股市投机盛行，更制造了一种“非理性繁荣”的假象。

而当“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走到尽头时，“紧急刹车”也已经难以力挽狂澜了。1929年10月，美国股灾突然爆发，不到三个月，股市总市值便蒸发了40%，26亿美元的财产化为乌有。之后，银行和企业大批破产，最终演变成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

关于这次大萧条产生的原因，当时惊慌失措的人们发表过很多看法，这些看法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极为“幼稚”。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还有人说，“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

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80年过去了，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解释，是目前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

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认为，大萧条的祸根在于当时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政策责任，酿成了金融系统近乎完全崩溃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倒闭——挤兑——倒闭的恶性循环。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Keynes，1883~1946）于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解释为“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人们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减弱了整个社会的购买力，从而进一步减弱了企业的投资意向，于是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近年来，一些学者则提出新的看法，比如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指出，导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财富的过度集中。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仅仅7年之后的1929年，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就上升到了36.3%。财富集中程度越高，越助长股市中的投机行为，易倒闭银行的数目就越多。同时，大批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则严重不足，于是衰退便越加严重。

总之，“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主流学者关于大萧条成因的基本解释。我们所熟知的“农场主将牛奶倒在河里”，几乎成了大萧条的一个符号，是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矛盾的集中体现。

不过在当时，卖不出去的不仅仅是牛奶，还包括房子，其他诸如汽车、摩托车、简易冰箱、收音机、电话等耐用消费品，也都堆积在仓库生锈腐烂。

在萧条之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将“有房有车”视为奋斗目标的时代。当年胡佛竞选总统时许下的诺言就是，要让美国人“家家锅里有两

只鸡，家家有两辆汽车”。鸡代表着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汽车则代表耐用消费品。这形象地表明当时的美国消费模式正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过渡。耐用消费品无疑是美国这个当时的“新兴世界工厂”经济上的重要增长点。

《美国经济史》提出了这样的数据：住房营造在192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就江河日下了。1929年动工兴建的住房只有50万幢（1925年约有100万幢）。1927年以后，汽车工业也急剧衰落。

毋庸置疑，房与车在20世纪之后的每次经济危机中，总是一对“难兄难弟”。

不仅如此，当时著名的“美国消费模式”，也就是“信贷消费”已经出现。而信贷消费的出现，自然是车、房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的发展所推促的。信贷消费，正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特征。这样一来，此次大萧条就不同于以往历次的经济危机。

“牛仔硬汉”遭遇“失业休克”（1）

毋庸置疑，房与车在20世纪之后的每次经济危机中，总是一对“难兄难弟”。

不仅如此，当时著名的“美国消费模式”，也就是“信贷消费”已经出现。而信贷消费的出现，自然是车、房之类的耐用消费品的发展所推促的。信贷消费，正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特征。这样一来，此次大萧条就不同于以往历次的经济危机。

因此，有学者指出：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很容易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信贷消费的空前繁荣、住房等耐用消费品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和非理性繁荣，这些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与21世纪的次贷危机又是何等地相似。

尽管凯恩斯、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对大萧条进行了各种解释，他们的理论也影响到今天，成为各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依据，但是大萧条的成因，却并不会因为经济学家的分析而消失，也许，它们和人类“贪婪本性”一样，永远相伴相生。而危机一旦产生，最先受到伤害的，却是靠工作养家糊口的普通员工。

灾难，随时会落到我们头上。正因如此，我们怎能不警惕呢?

“牛仔硬汉”遭遇“失业休克”

研究大萧条的美国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曾讲述过，在大萧条时代，纽约的每个周末都有几万工人被送到体育场观看橄榄球。等比赛结束、大家过瘾之后，老板就会站出来宣布：对不起，大家现在被解雇了！

当然，老板的初衷，是通过橄榄球比赛，“转移”人们得知自己已经失业时的惊惧。然而，对那些失业的人来讲，一时的懵懂之后，等待他们的是种种账单。这是想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男人，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折磨之下，一天天过着无奈的生活。

他们不仅仅失去了收入，也失去了精神上的自信和自尊。普遍的情绪是茫然失措，是对老雇主和整个生活的怨恨。一个失业的男人不再操心人们怎么看他，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蔫头耷脑、走路拖沓。

迷惘困惑、犹豫迟疑、冷淡漠然、自信尽失，是“长期失业”的结果。社会工作者将之称为“失业休克”——这些人像被恐慌攫住了一样，白天疯狂地去找工作，夜里在烦恼中沉沉睡去。

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他们更难找到工作，即使重新找到工作，也会肌肉无力、协调失衡、缺乏毅力。1933年，当40个长期失业的速记员被安排在纽约的一家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本来是老一套的日常工作，可他们全都很快显示出了神经性疲劳的症状，有几个人甚至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重新调整，才能不停顿地记录别人的口述。

失业对“白领”的影响更明显。1933年，美国一项对赋闲工程师所作的调查显示，4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士气显得比有工作的平凡百姓更低落。传统的美国文化，是崇拜强权、财富和男性力量的文化。在美国男人的心中，即便遇到了挫折，也不能怪罪社会。他们继承着拓荒时代的“牛仔硬汉精神”，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才能达到成功的顶点。金融巨头摩根、钢铁大王卡耐基，就是传统“美国梦”的一个缩影。

美国是一个新大陆，是强者的天堂！它没有欧洲的等级规范，而是充满了机会。任何人只要能干、肯干，就有机会成功。像卡耐基这样的穷孩子，在苏格兰的家乡没有任何机会。他13岁随父来美后，却从童工干起，而成为钢铁大王，其钢铁厂的产量比大英帝国的钢铁总产量还高。这种适者生存、强者为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比起欧洲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来，更能够唤醒人们的希望。大萧条时代，当罗

斯福总统向大资本家们要求公平交易、准备对金融巨头们开刀时，摩根桀骜不驯地说：“我不欠这个社会一分钱！”

对普通民众来说，当时很少有暴力反抗，人们认命，责怪自己不争气

“牛仔硬汉”遭遇“失业休克（2）

磨了美国人的进取之心，“美国梦”也不再如以往那么绚丽。过去的美国男人，崇尚勤劳和苦干，而现在，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以及对公司的忠诚，也日趋黯淡了。很多人都会说这样的话：“干活太卖力不值得，因为老板只会利用你。”那些摩根、卡耐基式的成功传奇，虽然还具有光泽，但许多“老规矩”似乎已经失效。

20世纪30年代中期，托马斯·杰斐逊大学的一位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对将近400个失业男人的调查显示，半数人同意这样的观点：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或“门路”，而不是能力。

很显然，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冲击，对男人的打击远甚于妇女。因为这种灾难直接摧毁每个美国男人精神上的自我标榜——那个精神上的牛仔，已经一败涂地了。

那时候，失业的男人处处碰壁，他们害怕回家，害怕被人瞧不起。按照人们的习惯，一个没有工作的男人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他们自己这么认为，家庭也这么认为。过去一直忠心耿耿的妻子，现在可以口无遮拦地责骂正在找工作的丈夫回家太晚，甚至会嘲笑他们：“只要想找工作的人，就一定能找到工作。”

失业，开始动摇父亲的家长地位。按照欧洲大陆的传统，丈夫和父亲本来是在家庭中实行“严厉独裁”的。然而，如果父亲失业，出钱养活家庭的年纪较长的孩子，会在“家庭议会”中获得了新的威信。如果妻子提供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她通常会掌握家庭的控制权，而失业的丈夫则只好转向家庭杂务。

过去，在休闲时间，男人们会拿出三明治和咖啡请朋友们玩一个晚上的牌。如今，他们只能用更多的时间陪孩子们玩游戏。

正是在大萧条时代，美国的家庭结构和妇女地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现代型的社会关系，在大萧条的阵痛中孕育着。

灾难中的柔韧力量（1）

关于女性在大萧条时代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柯卡在《艾柯卡自传》中这样写道：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母亲表现出了她的应变才能。她真是位典型的移民母亲，也是家里的支柱。一份5分钱的骨头汤也是我家的一餐，但我们都能吃饱。在大萧条变得更严重之后，她又到我父亲的餐馆帮忙，她还去过一个生产衬衫的工厂打工。她总是愉快地去做她的工作，至今她仍是一位漂亮的妇人，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大萧条时代，正是很多女性像艾柯卡的母亲一样，在家庭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或许是因为一种源自原始时代的自然分工——女性从事采集生产而男性从事狩猎，使得女性具备一种更善于应对贫困的天然能力。

不仅如此，上世纪30代，对于妇女参与就业，乃至妇女解放运动，也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时期。大萧条时，虽然已经工作的妇女往往是最先遭到解雇的，不过，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受打击最大的还是男人。

当时的美国，虽然妇女有了选举权，但还是个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社会。一般的家庭都是丈夫出去工作，妇女待在家里。大部分女工，也不过是婚前出去工作，结婚生子后只有十分之一在外面工作。无论在哪个行业，女性工人被认为是为了零花钱或补贴家用而窃取男性养家者的工作。所以，大萧条刚开始时，工厂解雇的对象，首先是那些拿“第二份工资”的妇女。

不过，这些妇女毕竟人数很少，而且当时有着严格的性别分工，所以失业率反而不高。而男人从事的工作，尤其是重工业，失业比例要高得多。这就猛然改变了家庭内的权力分配。本来男人是一家之主，是让全家吃饱穿暖的人，妻子对他小心、孩子对他敬畏。如今妇女接管了家庭财政，即使是政府的救济，也是发给家里的女主人的。

到了1930年，5个女人当中就有一个在家庭之外工作，女工的总数将近1 100万。她们的工资较低，而且通常也更听话，从而更受雇主的青睐。

然而，随着大萧条的继续，女性的这种优势也在缩小。失业的女人发现，再找工作已经很难了，为了战胜“容颜渐老、韶华不再”的障碍，一场女性主义运动打出了“永远28岁”的欢快口号，强烈要求女性雇主们雇佣女同胞当中更老的成员，以平衡男性雇主对年轻、美丽的偏爱。

还有一些失业女性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自谋职业”。她们拾起了老祖母传授的古老手艺，在家庭中制造肥皂、染色、制衣、烤面包、做蜜饯、烘干水果、腌制泡菜、制作草药。她们的手工制品比工厂生产的同类产品更为便宜，有不错的销路。有数据说明了这种新式家庭作坊的兴旺：1931年用来腌制食品的玻璃缸的销售量，超过了此前11年中的任何一年，而同时，对罐装食品的需求却逐渐减少。

大萧条是件坏事，但是也在客观上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如果一个男人养活不了整个家庭，就迫使很多女性，包括白人女性也去工作，有些女性带着孩子甚至背着孩子去上班。正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了几个知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如玛莉·麦克里欧德·贝颂，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非裔美国女性教育者；弗朗西丝·帕金斯，美国第一位女性内阁成员，她提倡8小时工作制，主张实行更严格的工厂安全法规，以及各种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力的法规。

由此说来，西方的妇女运动更多的是一个改良运动，它有点水到渠成的味道。正是从大萧条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女性慢慢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确立了今天的女性就业格局。

缩水的幸福——合住房与午餐肉（1）

缩水的幸福——合住房与午餐肉

大萧条使得美国人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有些变化一直影响到今天。

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代表“幸福家庭生活”的电器，如电烤箱、搅蛋器、咖啡渗滤壶、洗衣机、电炉、缝纫机等，都卖不出去了，1930—1931年间，还减少了大约4万部电话，而家用轿车的销量，更是自由落体一样下坠。

而另一些商品却成为萧条时代的新贵。比如冰箱，因为能够储存和节约食物，便迎合了市场。还有香烟，作为医治“大萧条过敏症”的一种安慰品，其产量从1930年的1 230亿支，增长到了1936年的1 580亿支。

大萧条之前，美国餐馆的数量比家庭的数量增加得还要快，而大萧条之后，餐饮行业的生意减少了63%，多数家庭放弃了“上馆子换换口味”的奢侈。

在大萧条时代，美国人霍梅尔（Jay Hormel）发明了廉价的午餐肉，成为普通大众“挨日子”的首选。午餐肉的主要材料是猪肉、糖、盐、水和马铃薯淀粉，再加点硝酸钠让肉块永葆粉红色。当时很多人买不起肉，而午餐肉比牛肉、猪肉便宜，打开就能食用，正是它帮助很多纽约人渡过了难关。

午餐肉不仅是大萧条的标志，它还被誉为“帮助美国打赢二次大战的食物”。二战期间，午餐肉成了美军日常食品，并随着美军征战各地而迅速推广至全球。

后来随着战后经济复苏，以及健康饮食主义的兴起，午餐肉渐渐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淡出。而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重挫经济，又令午餐肉“东山再起”。午餐肉制造商、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霍梅尔食品公司，不得不24小时轮班生产，以满足市场的庞大需求。

研究午餐肉历史的作家布莱克说：“从心理上来讲，午餐肉是一种令人（在逆境中）获得安慰的食物。”午餐肉能满足一些饿着肚子、既想省钱又想吃肉的消费者。于是，它也就成了判断经济景气的指标。

只要大萧条依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人们就不得不青睐节省，不仅仅是衣食上的节省，还常常包括住房上的节省。

富人的节约包括关闭或低价卖掉位于纽波特、巴尔港、棕榈滩或圣巴巴拉的“村舍”，或者出让法国南方的别墅。中产阶级可能不得不退掉海滨或山区度假胜地的一幢租来的房子，并搬到镇上的一幢花费较少的房子或公寓。与父母、公婆、岳父母和雇员“挤在一起”的情况不计其数。对64座城市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1934年1月，在美国的所有家庭中，“特大家庭”的数量所占的比例从2%上升至15%，比例最高的是南方。

大萧条持续了十年的时间，在我们的历史眼光中，10年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种尴尬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熬出头，这是一段漫长到看不到终结的时间。

在这样的生活境遇中，人们无法不盼望“救星”。然而，大萧条毕竟是经济长久失衡形成的，各种问题积重难返，就连“罗斯福新政”也不能一下子把美国人民带出深渊。

当时给了穷人们巨大的安慰、支持着他们在困顿中生活下去的，却是一些并不伟大的人和物。正是他们，堪称大萧条时代人们真正的“救星”。

资料： 1930—1939年，这十年的美国

人口：48个州，123 188 000；

平均寿命：男性，58.1岁；女性，61.6岁；

平均薪资：1 368美元；

失业率：上升至25%；

（民主党政治家休伊·朗提议年均收入应保证在2 500美元）

汽车销量：2 787 400辆

食品价格水平：牛奶，14美分/夸脱；面包，9美分/个；牛后腿肉，42美分/磅；

美国很多最著名的摩天大楼（如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和洛克菲勒中心）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穷人最需要精神支柱（1）

穷人最需要精神支柱

大萧条时代，也是《白雪公主》、米老鼠和秀兰·邓波儿的时代，因为失业和困顿的人民最需要安慰。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每星期看一次电影。同时，听收音机和泡图书馆也成为人们的重要生活内容，因为“没有事情可做”。甚至简单的家庭游戏如拼图、跳棋、国际象棋、掷套圈都大受欢迎，人们要么是用它们消磨时间，要么排遣焦虑。罗斯福总统所倡导的消遣方式是集邮，在他上台后的五年间，政府发行了约100个新邮票品种，美国集邮者的数量也从200万人增加到900万人。

人们通过阅读来逃避现实，于是悬疑小说大行其道。人们喜欢的作者包括阿加莎·克里斯蒂、达许·汉密特和雷蒙·钱德勒。1933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估计，自1929年以来新增的借书人数为200万~300万。不时有顾客对图书管理员说：“要不是因为有图书馆，我没准早就疯掉了，或者自杀了。”

在整个30年代，广播达到了巅峰。到1939年，大概80%的人拥有自己的收音机。肥皂剧和新闻是最受欢迎的，数百万人专心致志地收听关于慕尼黑危机、德国入侵波兰和法国陷落的消息。广播中的“炉边谈话”是“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罗斯福总统每次广播讲话，都以那句平民化的称呼“我的朋友”为开场白。每一次的“炉边谈话”之后，罗斯福经常能收到5万封听众来信。

20世纪30年代更是好莱坞的“黄金年代”。好莱坞一部接一部地推出电影，大多数电影的内容依然是为了逃避现实而设计的，大肆表现奢华和传奇，以及情感的世外桃源……

去看电影的人们常常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他们想忘却生活的烦恼，他们迷上了克拉克·盖博、贝蒂·戴维斯、葛丽泰·嘉宝和埃尔罗·弗林这些偶像明星。1936年，美国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成为大萧条时期

人们的慰藉，所有的美国人都喜欢这个卷头发的小女孩，连罗斯福总统都感谢她“在大萧条时期为千千万万美国人带来微笑”。而沃特·迪斯尼的动画公司，也是在这一时期壮大起来的，它于1937年制作了首部长篇动画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大萧条时代，有一位创造奇迹的“经济学家”，它的名字叫Mickey，中国人翻译成“米老鼠”，它产生于沃特·迪斯尼1928年的一个灵感。在20世纪30年代，沃特·迪斯尼投拍了一系列米老鼠动画片，博得了萧条时代人们难得的笑声。

米老鼠能使一家制衣厂有着做不完的生意，仅是制造一种印有五颜六色米老鼠肖像的毛衣，就使这家工厂一年获得百万订单，三分之一的工人不得不加班。它还能让美国的一家名表厂起死回生，因为印有米老鼠图案的手表，每年能够卖出200万只。

1935年，《纽约时报》毫不吝啬地赞誉这位“经济学家”，说道：“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不可思议地在商人领地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他是世界上的超级推销员，为失业者找到工作，将公司从破产境地中救出。无论他在何处，希望的曙光都会突破云层。”

1934年，米老鼠的好朋友唐老鸭诞生了。这是一个为了生存劳苦奔波的倒霉鬼，它脾气火暴、好与人争执、喜欢夸大事实、经常抱怨生活中的小事和不如意的地方。它追求爱慕虚荣的异性，但从来都没有成功过。这个角色像极了大萧条年代的失业男人。

出门找工作的男人打的领带和手绢上印着“米奇喜欢米妮”，让雇主一看就觉得是个靠得住的顾家男人。女人们在菜市场用米老鼠钱夹付钱，虽然里面的现金少得可怜，但有希望的好日子总是有盼头的。

资本主义“从冷血到温情”（1）

资本主义“从冷血到温情”

学者们分析，大萧条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建立，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总需求。

直到1935年，美国人还是既无养老保险，也无医疗保险，更无失业保险。在美国人得意洋洋的20世纪20年代，人们甚至一度将“永远向上攀升”的股市当作美国人的“经济保障”，这足以见证美国股市当时的投机与疯狂。一旦股市崩溃，经济危机引发大萧条，城市失业人口大增，没有社会保障的美国城市人口就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失业者。

缺少社会保障，自然影响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也是经济危机的发端。然而，从1933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这种情况改变了。

罗斯福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十分懂得经营自己的魅力，在他身上也确实拥有种种可以被称为“领袖才能”的品质，如勇气、直觉、计谋和远见。他曾经遭受脊髓灰质炎的折磨，这反而使他更加具备意志和雄心。他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苦难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更具有催人向上的力量。

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即为克服危机实行了“新政”。他一方面维持银行信用，实行美元贬值，刺激对外贸易；同时更为有力地运用行政干预，实行缓慢的通货膨胀，广泛开展公共工程建设和紧急救济，实施社会保险，以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购买力。解决失业问题，更是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

1933年3月，罗斯福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 18 岁到 25 岁的失业青年，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道路建筑、开辟森林防火线和设置森林瞭望塔等工作。到美国参战前，先后有 200 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 740 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

1933 年 5 月，国会通过《联邦紧急救济法》，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将各种救济款物迅速拨往各州。全国 1 700 多万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维持生计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业的帮助和施舍。第二年，罗斯福又把单纯救济改为“以工代赈”，致力于给失业者提供从事公共事业的机会，维护了失业者的精神和自尊心。

新政期间，全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综合起来可分成两大系统：以从事长期目标的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款 40 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 10 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先后为 400 万人提供了工作。

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 180 亿美元，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 1 000 座飞机场、12 000 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还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救济计划。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艺术和建筑也是由政府项目来支撑的，比如“公共工程艺术计划”和后来的“联邦艺术计划”。这些计划根据美国历史和文化来选题，所雇佣的艺术家在某些时期超过了5 000人。图为雕塑家格鲁·博格勒姆在工程振兴局（WPA）的资助下完成的拉什莫尔纪念像，又名“总统山”。

罗斯福新政的另一个成就是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驯化弱肉强食的“冷血资本主义”。从1935 年开始的第二期“新政”，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着重通过《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公用事业法案》等法规，以立法的形式巩固新政成果。

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不能照顾老者和病人，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保险金的来源，一部分是由在职工人和雇主交付，另一部分则由联邦政府拨付。

1881年，俾斯麦就为德国确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而美国直到1935年才正式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比德国晚了近半个世纪，也比欧洲许多国家滞后了三四十年。然而，美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是最为完备的，很多政策至今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借鉴。

1937 年5月24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受到广泛注意的关于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立法的咨文，并于1938 年6 月14 日通过。这就是《公平劳动标准法》（又称《工资工时法》），它的主要条款包括：每周40 小时工时，每小时 40 美分最低工资；禁止使用 16 岁以下童工，在危险性工业中禁止使用 18 岁以下工人。

关于最低工资的规定，随着经济的发展，日后陆续有所调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的很多规定，如“40 小时周工时制”和16岁的最低工作年龄，至今仍为很多国家沿用。

美国梦不变（1）

美国梦不变

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前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抓住了“大萧条”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从西方引进技术、大量进口机器、吸引国外贷款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前苏联工作。1932年，在前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 919人，技术人员10 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

苏联当时处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阶段，却获得了成功。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前苏联却在1930年基本消灭了失业。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讨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前苏联是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从前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前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而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也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进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影响了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主义。

大萧条也对美国人的精神信念产生了影响。那些失业者、失败者们，依然相信摩根、卡耐基时代的美国梦，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自身。不过大萧条之后，“美国梦”变得更为务实，重商主义的倾向更为强化，人们对财富的崇拜更为长期了。

就像艾柯卡在《艾柯卡自传 》中写道：“经济大萧条使我成为唯物主义者。到我大学毕业时，我的人生观是‘我不需要什么人生大道理，我要在25岁时做到年薪1万美元，然后我要成为百万富翁。’我对装饰门面的学位不感兴趣，我只想发财致富。”

对于“罗斯福新政”，历史学家也多有批评的声音。近年来，一些美国学者指出，若对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国民生产总值、货币供应和物价等统计数据稍加研究，人们会发现复苏并没有随“新政”而来。“虽然复苏是‘新政’的一个目标，但在这方面‘新政’几乎算不上是全面成功的。”

但不管怎么说，罗斯福政府推行的“新政”对其他西方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主要国家普遍认为，美国实行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是成功的。因此，二战结束以后，“政府干预经济”及按照这一思路“实行经济改革”等举措在主要西欧国家风靡一时。

但是，在谈到“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的重大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对美国经济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其中，最大的不利影响在于，“新政”推行的“以巨额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发展”的方针为美国此后连年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不断上升播下了种子，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滞胀”埋下了隐患。

很多学者同意，从1933年开始的“新政”，并没有使美国走出大萧条，美国人勒紧裤腰带又苦熬了七八年。真正的救星，还是二战。战时的军需，充分吸收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大量美军出征，又使美国从一半劳动力闲置转变为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乃至呆在家里的妇女都被鼓励出来工作。

二战结束后，美国产品又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如洪水般地席卷了世界，整个西方世界变成了美国的庞大市场，为美国迎来了50年代的又一个发展繁荣阶段。